

從波昂轉到哈佛—— 熊彼德學術生涯又一轉折

張建生



在上期中，我寫了一篇「從商場回到學府」，說明熊彼德自從於1926年到德國波昂大學執教以後終於重新回到他畢生最相宜的學術生涯，並從此不再回返維也納，以示其再無從事政商活動的決心。當時雖不久就發生一連串的家庭悲劇使他哀痛不已，但後來也逐漸克服。到了1928年以後可謂已恢復正常，他每天工作甚為勤奮，除了為應付沉重的債務寫了一些應時的文章以及據而作了一些講演，以賺取額外收入外，所有時間可以說都用於學術的研究。其重心可分為三方面：一為貨幣理論的探索，二為經濟變動理論的闡揚，三為基礎廣博之經濟學，也就是他所謂社會經濟學的建立。這可以說是與他自己在所謂神聖的青春年代所樹立的方向是一致的。當其在波昂其間，這三方向都獲有相當的成績，現可略述於下。

先以貨幣理論說，這是他一直想寫出這樣一本書，以成為他的第三部的主要著作。但當他寫了數章以後，凱恩斯(J. M. Keynes)卻於1930年捷足先登地出版了「貨幣論」(A Treatise on Money)。他發現其內容與他所要寫的相差不多，雖然觀點並不相同，就覺得不必重複了，所

以就將這些手稿束之高閣。到了他第二次赴美哈佛講學時就放在斯卑托夫手中。後來曾取回要重行撰述，但終未完成。在他逝世以後曾從其所遺文件中發現有此初稿，其中並註明在未經修改完成前不能出版。但後來坊間還是將之以「貨幣的性質」(The Nature of Money)為題而發表了，使我們能更深入瞭解他對於貨幣的見解。可見他在這方面也確有相當成績。

其次，對於經濟變動理論，他也在繼續研究，其中有二個層面：一為經濟景氣循環，二為經濟制度之結構性的變動。在1920年代，一般經濟學家都注重經濟景氣循環的變化，這是因為當時經濟統計資料的數量與品質都已有長足進展的關係。他當時則以手頭不易得到這類資料而未作深入的研究。但對其理論亦有相當的貢獻，例如當時一般都著重以九、十年為一期的所謂朱格勒(Juglar)循環，他則認為經濟社會中除了上述的一種外，還同時存在著長達五、六十年的長期波度(Long wave)以及為期四十餘月的短期循環，這就是他的一種創見。對於第二個層面，他亦繼續研究，而有我在上期「從商場重回學府——熊彼德生涯中的一大轉折」一文所提